

陕甘宁边区：从长征落脚点到抗战出发点(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从血的教训中更加深刻体会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也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然而，拿起“枪杆子”的斗争，并非一帆风顺。在陕甘地区，从陕西省委组织发动的清涧、渭华、旬邑等武装起义，到后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深入陕甘地区国民党和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的兵运工作，都因敌强我弱而失败了。

我们党最懂得从挫折中汲取教训，革命先辈认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于是，刘志丹和谢子长分头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两支隊伍后合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游击队的斗争，虽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但亦须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作为依托，而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绝对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1932年初，因军阀变本加厉地向农民索粮

催款，陇东人民被迫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民团奋起反抗。当时正在陇东一带活动的陕甘游击队趁势将这支队伍改编为赤卫军，为此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1932年3月，陕甘游击队以正宁县寺村塬为中心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了陕甘边区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在宜君县转角镇，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标志着陕甘地区有了正规的工农红军队伍。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照金镇成立，并于4月召开了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以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红色政权建设初具规模，土地革命斗争轰轰烈烈。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亦非一帆风顺。1933年10月，正值“左”倾错误路线盛行，再加上军事力量对比依然敌强我弱，在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而内线驻守力量薄弱的情况下，照金根据地遭国民党重兵进攻而失守。陕甘边区

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建立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关中照金相互支持的三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虽兵分三路，但不失核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由此打开了游击战的新局面，随后又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创建了安定、绥清、神府及葭县等苏区。到1934年8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覆盖18个县，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毛泽东曾评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种“狡兔三窟”式的创建办法“很高明”。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一边建设根据地，一边开展武装斗争。此时，国民党正发动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为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协同进行反“围剿”作战，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经过长达5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先后消灭国民党军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了陕甘苏区。

一边打破“围剿”，一边发展巩固。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陕甘红军在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打大仗，打胜仗，尤其是取得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由此，陕甘苏区凝聚了队伍，赢得了民心。但纵观全国，这一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却是当时仅存的“硕果”。正如习仲勋所说，“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险阻，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也正因此，红军长征最终确定落脚陕甘，成为历史之必然。（据《学习时报》）

中共宁夏地下组织英勇悲壮的奋斗历程(一)

宁夏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较早的省区之一。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6年，中共就在宁夏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革命活动，距今已有94年的光荣历史。在地方军阀马鸿逵为代表的封建反动势力长期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下，宁夏地下党的斗争环境非常严酷，斗争形势极端险恶，党的组织屡遭破坏。历届党组织不断奋起，领导回汉各族人民为推翻国民党和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反动统治，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走过了长达23年的艰难曲折、英勇悲壮的奋斗历程。

在这23年中，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成立的5个特支（其中1个名称待考）、3个县委（盐池、豫旺、豫海，不包括原固原地区）和一个区委、两个跨省区的特委（西北特委、甘宁青特委），到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两个工委（以杨一木、李仰南为书记的宁夏工委）和以崔景岳为书记的宁夏工委），除在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师建立的特别支部随军调离宁夏、盐池县从红军西征时建立县委和苏维埃政权起，一直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后为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外，其余党的组织屡遭敌人破坏，从而使党在宁夏的革命活动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状态。直到

抗日战争后期特别是1946年5月恢复和重建宁夏工委以后，将党的工作机构设在三边解放区境内，采取单线联系的方法，在宁夏国统区开展秘密工作，党的组织才趋于稳定发展，革命斗争才取得节节胜利。这是宁夏党的发展史中不同于其他省区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及其革命活动

1926年9月，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率国民联军入甘援陕。在国民联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部分共产党员随先遣部队宣传队进驻宁夏城，他们与受陕北党组织委派，前往兰州刘郁芬部军事政治学校学习经过宁夏城的中共党员一起，组建成立中共宁夏第一个特别支部，书记李临铭，时有党员7名。同时成立了国民党宁夏县党部。特支办公地点在今银川市鼓楼。

特别支部成立后，同国民联军中的中共党员一起，在宁夏城举行演讲会，举办马列主义学习班、读书会，建立工会、农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和“中山俱乐部”“列宁室”等，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活动。大革命时期，特别支部共有党员14名，团员20余名。特支先属国民联军中的中

共党组织领导，1927年3月后，直属中共陕西省委领导。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的“清共”运动于9月在宁夏开始，特支党员被迫离开宁夏，特支的活动遂告中断。特别支部虽然只存在了一年时间，但在宁夏传播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7个党组织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展开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当时宁夏虽然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但党在这个地区坚持开展地下斗争，党的组织时断时续，学潮兵暴此起彼伏，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一时期党在宁夏先后建立过4个特支（其中一个名称待考），一个区委，另有两个跨省区的特委。

在宁夏驻军骑兵四师建立的特别支部。1929年末，中共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张东蛟、高岗等人来宁夏，在国民革命军骑兵四师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1月，在该师组建了学兵大队，张东蛟任大队长，高岗任副大队长。学兵队驻平罗县姚伏堡和贺兰县立岗堡。在组建学兵队的同时，建立了中共特别支

部，书记张东蛟，副书记高岗，直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特别支部共有党员30余名，下辖4个支部，即学兵支部、八旅两个支部、九旅支部。特别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开展兵运工作，等待时机，发动兵暴，争取建立党的武装。特别支部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几个月后，特支随军离开宁夏。

以杜润芝为负责人的党组织。1930年8月，中共顺直省委和陕北特委乘宁夏中招考聘教员之机，先后派遣原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成员杜润芝和赵子元、马汉文等人到宁夏；10月，原在河南开封一中任教的中共党员郭逸民、刘梅村等6人亦由北平来宁。他们以教书等职业为掩护，由杜润芝负责，建立了党组织（名称待考）。他们团结进步师生，发动了“宁中学潮”，使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进步教师手中，为党的秘密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后因宁夏当局从陕北一小学校师给杜润芝的信中发现有抨击时局的词句，遂以“共产党嫌疑”逮捕了杜润芝，解聘了其他几名党员的教职，限期离宁。

此后，陕北特委又派张德生到宁夏，与狱中的杜润芝取得联系，组织发动了宁夏城“小南门兵变”和“中宁护路队兵暴”（均未遂）。

（据银川党史网）

米，宽约50多米。惠农渠俞家嘴二闸北距惠农渠龙门桥三闸约1公里，说明陶家嘴之南是惠农渠俞家嘴渠口，也说明《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流”与《惠农渠碑记》记载的地名与实际相符。

据花家庄老者讲，惠农渠花家湾俞家嘴进水口渠东清代建有龙王庙，为砖拱窑洞式建筑，共10余间，庙内塑有通智、岳钟琪、单畴书坐像，此庙文革时期拆毁。乾隆《宁夏府志·渠图》也标示惠农渠口东筑有退水，退水闸大概建在龙王庙附近，退水沟直入西河。20世纪80年代，当地村民自发在原龙王庙处新建一间龙王庙，现龙王庙破旧不堪。《惠农渠碑记》还记载惠农渠修成后，又“于渠之东，循大河（西河）屋簷长堤三百二十余里，以障黄流泛滥；于渠之西，疏通西河旧淤三百五十余里，以泻汉（延）唐（徕）两渠诸湖碱水”“而大渠长堤以至西河，兼恃防护渠堤。渠两岸俱夹植垂杨10万余本，其盘根可以固坝，取其材亦可以供岁修”。其长堤的作用是“以防河水冲渠坝”。长堤分旧堤埂和新堤埂，《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流”记载：“旧堤埂，自王泰堡起，筑至平罗、石嘴口，长三百五十里；新堤埂，是乾隆五年复修，自王泰堡起，筑至平罗县北，贺兰山坡，长三百二十五里。今仅存遗迹。”由此而知，惠农渠是开在西河左岸（西河之西），西河位于惠农渠东，西河与惠农渠之间，先于雍正七年（1729）筑有旧堤埂，由于雨水、河水冲刷失去防洪作用。又于乾隆五年（1740）重修新堤埂。乾隆《宁夏府志·渠图》中标示有堤埂。（据《宁夏文史》）

移民岁月

第九十九期

YI MIN SUI YUE

电视剧《灵与肉》的原型来源于宁夏农垦(四)

一天，一位好心的工人偷偷告诉严纪彤，第三批抓捕坏人的名单中有他的名字，让他快点逃跑躲避风头。王柏玲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惊恐万状，不知如何是好，她想，万一丈夫被逮捕，我该怎么办？一家老小又该怎么办？经过他俩再三考虑决定不能逃跑，否则就是畏罪潜逃。于是，他俩壮着胆子，找到农场主要领导



1978年王柏玲、严纪彤参加自治区科学大会。

据证实是严纪彤投毒杀猪？这时，这位领导矢口否认要对他实施抓捕。

1962年，中央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农场党委也开始重视他们正在进行的新猪种培育，拨出专款，恢复种猪场，引进良种猪，进一步有计划、按步骤培育“灵农型”新猪种。严纪彤和王柏玲的工作情绪高涨，起早贪黑，整天蹲守在猪场，期盼早出成果。就在这一年的十月，他们的小儿子出生了，由于有公婆的帮助和照料，他俩也有充裕的时间从事自己的专业，内心无比充实，决心尽快完成这项研究。很可惜的是，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意。

1964年，全国又开展了“四清运动”，紧接着十年动乱接踵而来，他俩虽未被划为“黑五类”，但也列入“运动”的对象，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运动在不断深入，但作为农场，田地仍要耕种，猪还要喂养。这时，王柏玲被下放到猪场，不能搞技术，只能每天担着几十公斤重的猪食去喂猪，成了一名饲养员。

1967年，严纪彤和王柏玲家的周围被人日夜监形，扬言要揪斗他俩，眼看形势混乱，农场此处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们向朋友借了200元，带着孩子如同“逃难”的难民一样乘火车南下，回到南京，与3个

弟妹相聚。4家十几口人在一起度过了1个多月。国外的父母得知严纪彤和王柏玲的情况，非常担忧和着急，只能寄点钱给他们，以维持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在南京滞留了40多天后，接到农场同事电报，解放军进驻农场，革委会宣告成立，要求他俩急速回场参加抓革命，促生产。他们一家才依依不舍离开了亲人，回到了农场。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在农场干部中展开，严纪彤和王柏玲又被列入“重点对象”。批判他俩不重视政治，只埋头搞业务抓技术，是“唯生产论”的典型。在莫须有的罪名下，严纪彤和王柏玲只能在压抑的政治环境下生存，他们研究的“灵农型”新猪种工作被搁浅。

1976年，国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国外的父母也催促他们全家移居巴西，积极为他们一家办理出国移民手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得到进一步落实。严纪彤和王柏玲夫妇双双出席了自治区科学大会，知识分子春天来了。紧接着王柏玲又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被评选为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受到中央及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

（崔殿龙 祖宁平 撰稿）

支宁教师 西行铺路 ——记宁夏大学原校长张奎（二）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张奎讲授热力学课，这块控制演示板是他自己动手制作的。

在另外一次的全国两会上，三峡建设方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会议组织者希望各个代表团尽可能统一思想。宁夏代表团在讨论时几乎所有代表都表示按要求投赞成票，但张奎又有不同观点，他提出：三峡水利工程事关重大，很多代表对水利工程的利弊和长远影响很难搞懂，建议会议的组织者请相关水利专家给每个代表团讲解工程方案后，再交代表审议提交表决。这个建议又与大会组织者意见相左，成为绝对少数，没有得到回应。那年的表决中，投出反对和弃权的人数相对较多。

张奎平时话不多，初次相识后会给人一种孤独感，但真的与他打交道多了后才知道，他很热情，而且特别健谈，每每到新鲜事时都会举一反三地联想。也是全国两会，因宁夏代表团少数民族较多，代表驻地京西宾馆专门给宁夏代表团安排了个小型餐厅，圆形餐桌上有个能旋转的二层平台，当时这种旋转平台十分少见。很多人对此赞不绝口，而张奎却一言不发地研究起了带动旋转的电机，两天后他给餐厅服务员拿出一张画好的图纸，上边有电机的模型，在电机下边又增加了一个可调节电流大小的电位器，控制旋转速度。服务员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十分重视，将张奎

绘出的图纸和方案上交领导。几个小时后，生产餐桌的厂家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京西宾馆，找张奎请教教义。张奎还建议，还可搞个可逆电机，使旋转有顺时针和逆时针两种选择。后来听说，他的两个建议被厂家采纳了一个，成为当年宁夏代表团参会中的一个趣谈。

张奎的出生可算是生不逢时，刚出生抗战的枪声即在卢沟桥打响。张奎的父亲在当时的北平算是较有成就的富人，家有田产百十来亩，还有些商贸钱行，资产涉及事实民生。父亲信奉善良、勤劳与节俭，全家大小在衣食无忧中特

别重视子女的教育。整个抗战时期，北平都在日本人的占领之下，受日本人的管制、花日本人的票子，还要对日本人的横行霸道忍让三分，这些都让张奎幼小的内心十分不满又敢怒而不敢言。上小学时成绩平平，主要原因是他特别不喜欢亲日的国文课女老师，老师讲的中日亲善与他每天看到的日本人在城里横冲直撞的情景出入太大。学校还要学习日本话。由于厌烦日本人，日语考试成绩往往很差。学校的多数老师也明里暗里透出对日本人的反感，对日语成绩的好坏不闻不问，即使这样，张奎的学科平均成绩也没提高多少。

张奎：我在学习上开窍实际上是上高中以后，在这之前上学的兴趣很小，是家里人逼着去念书，能逃学就逃学，到了学校只要有玩的就有我，关键的原因还是社会不稳，心里没有方向。解放后北平市改叫了北京，我父亲是位开明绅士，欢迎北平解放时就把手里的房子腾出来让给解放军住，还给新政府捐了很多粮食，当选过北京市政协委员。我父亲身边有很多开明人士，听他们聊天对我有了较大的影响。但真正有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是因为解放军进城后的表现触动了我。（商银生 撰稿）

惠农渠数次移口溯源(上)



惠农渠朱家河渠口遗址。

流》惠农渠条下记载：“口开在宁夏县叶升堡俞家嘴南，并汉（延）渠而北，稍至平罗县西河堡归入西河，长二百里。”通智在《惠农渠碑记》中对当时开渠情形记载更为详细：“乃相土宜，度形势，以陶家嘴南花家湾为进水口，近在叶升堡东南也。黄河自青铜峡口而下，支派分流，至此而滔滔汨汨，顺流远引，足溉数万顷田。其渠口石子层累，底岸维坚，由此而东北，遍历大滩。择地脉崇阜处，开大渠三百里，口宽十三丈。”根据上述记载，出现了《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流”记载“口开在宁夏县叶升堡俞家嘴南”，而通智在《惠农渠碑记》记载“以陶家嘴南花家湾为进水口”，是不是记载有误？

清雍正二年（1724）十月，将宁夏左屯卫改为宁夏县，叶升堡属之，花家湾、俞家嘴、陶家嘴都是叶升堡

南和东南的三个地方的地名。现根据实地考察，陶家嘴位于花家湾东北，惠农渠东，叶升堡东南，是叶升镇龙门桥三闸退水河北岸的自然村，原地名陶家嘴，现为龙门村第一村民小组，其西为惠农渠三闸，其西南约1公里处是惠农渠二闸。而花家湾是今叶升镇龙门村第四村民小组所在地，原地名花家庄，又称花家湾，位于叶升堡南，东距惠农渠200米，原西河经村庄南约1200米流过，形成一倒S形大湾，地名俞家嘴。现花家湾东南有惠农渠二闸遗址，清代、通智、单畴书在花家湾俞家嘴从西河开惠农渠口，在惠农渠筑小跳（潜坝）控制水位，在西河筑大跳抬高水位保障惠农渠进水，并在渠口下建惠农渠俞家嘴二闸，利用俞家河排惠农渠余水，现惠农渠道遗存有原进水口小跳（潜坝），长约30多

惠农渠首次开口于花家湾

古代，黄河自青铜峡峡谷流出，流到今青铜峡黄河铁桥下约1公里的老王滩南部滩头后，受滩头淤积石结阻塞，分为东西二支，东面的一支，在《水经注》中被称为“枝津”，向东北方向流去；西面的一支被称为西河，沿今青铜峡市大坝镇王老滩村第七村民小组西，大坝营东径直北流；枝津与西河至平罗县北二流合为一体。西河自汉武帝时就被利用，多代开渠引西河之水灌溉，清代又利用开惠农渠。《宁夏府志·水利》记载：“世宗皇上（顺治）时开惠农、昌润二渠，增溉农田数万顷，利赖尤大业。”《朔方道志·水利志》上“渠道源